

总第三十辑

2007.4

宋小川 中国经济到底翻了几番？

翟华 改行当个经济学家最容易

聂辉华 谁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

荆林波 杂谈京城经济学人的尴尬

王则柯 「高微热」之我见

汪丁丁 为经济学划界

宋胜洲 学术的 OEM 与 ODM 模式

朱富祥 女性适合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吗？

纪辛 中国经济学界的曾经领军人物——方显廷

赖德胜 学问靠真

张晓晶 哈佛散记（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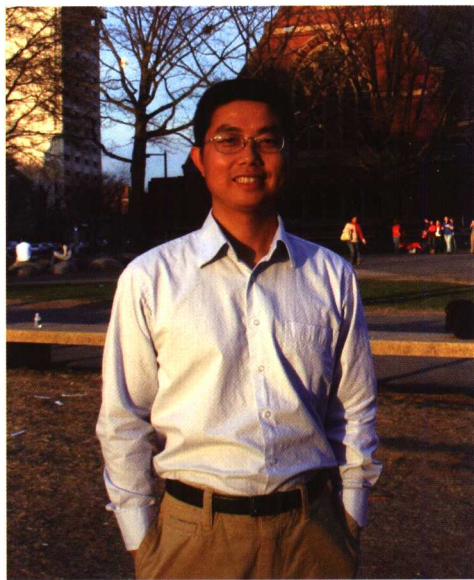
李俊慧 「劣币驱逐良币」的神话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1969年出生于安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曾赴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哈佛大学经济系与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出版《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书店）等专著，在《经济研究》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一届论文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一直在做经济学，自然也体会到经济学（家）的尴尬。有时，经济学因太入世而备受指责，如最近的中国经济学（家）；有时，经济学又因太出世而遭到批判，如今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阿克洛夫就直陈：主流经济学基于抽象的假设而非实际所观察到的经验，是走上了歪路。

引一段我喜欢的画家吴冠中先生的话：将作品比做风筝，风筝必须能离地升空，但风筝不能断线，这线，是作品与人民感情千里姻缘一线牵之线，是联系了作品与启示作品灵感的线体之间的线。我也往往踩在断线与不断线的边缘，但仍愿立足于不断线的范畴里。

“风筝不断线”也正是我的经济学立场。其实，经济学家不是“生活在别处”，而就生活在尘世里，生活在你我中间。海尔布伦纳称经济学家为“世俗哲学家”。感谢《茶座》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回归世俗的平台。

欢迎订阅山东人民出版社系列《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系列《茶座》以轻松、休闲、高雅为特色，追求思想性与趣味性，深入浅出地对经济、社会、法律、历史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剖析与评说。



读者朋友可通过全国各地新华书店购买，或通过全国各地邮局订阅，也可以通过邮局汇款至出版社订阅，免邮购费。汇款时请务必在附言中注明所购《茶座》名称、辑数及数量。汇款地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收款人：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邮政编码：250001。邮购电话：0531-82098021。联系人：宋先生。

《经济学家茶座》，每两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底出版至第32辑，2008年底出版至第38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180。

《社会学家茶座》，每两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底出版至第23辑，2008年底出版至第29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192。

《法学家茶座》，每两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底出版至第18辑，2008年底出版至第24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193。

《历史学家茶座》，每三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底出版至第10辑，2008年底出版至第14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50。





卷首语

说“换门脸儿”

金明善

单位宿舍坐落在城市中心的一处名胜风景区，周边多是些高档住宅，虽非闹市，但一条东西向马路和一条南北向大街形成的丁字路口处，有一些服务社区的商业设施和一个农贸市场，平日里购销两旺，生意一向繁荣。

两年前，临丁字路口一侧，原有一家中档偏下水准的中餐馆，大堂内有两排零餐桌，另有十来个单间，菜品普通而不贵。因为离家近，偶尔招待个客人，或者因错过饭点，买份快餐诸如水饺、包子等带回家，感觉很方便。看其生意也一直很不错。忽一日，看到其“内部装修，暂停营业”的告示牌，再过数月，见其门前车水马龙，门脸换成了“正宗韩国料理”招牌，两溜祝贺开业的花篮摆满了人行道。过后不几日，有朋友小聚，图个新鲜光顾了一次。内部装修确实上了档次，服务员着装整齐鲜亮，且彬彬有礼。因为想品尝一下正宗韩国料理，让服务员推荐了一个标准较高的套餐。泡菜、烧烤、狗肉、辣白菜……一道道下来，吃的没有剩的多。当时看人气还行，但朋友们议论，普遍感觉长不了。果然，不上数月就遭遇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接下来，又是装修，又是换门脸，改成经营粤菜的酒店了，但这之后，从未见其红火过。

商场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好的投资回报取决于很多因素，诸如品牌形象、供求关系、成本费用、软硬件设施、定位特点、营销推广、服务质量，等等。

盘点《茶座》，开张已经七年了，从最初的“叫好叫座”，到接下来的平稳发展，其间也曾冒出来一些跟风、模仿者，但大多一闪而过，而《茶座》依然备受读者青睐。这显然得益于《茶座》始终坚持了“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的定位特点，同时也得益于“店面主持”詹小洪一向坚持的微笑服务，团结了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善用普通读者看得懂的语言表达学术的撰稿人。

不管是新老招牌，只要勤于擦拭不让其蒙尘，定然会容光宜人！



经济学家茶座

(第30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刘德久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系列《茶座》编辑部主任
《经济学家茶座》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编 辑

陈丹丹

【卷首语】

金明善 说“换门脸儿” /001

【国是我见】

宋小川 中国经济到底翻了几番? /004

李海舰 领导干部要重视“案例工作法” /012

高明华 国有企业是做什么的 /014

李华芳 为什么有的国企工资高,有的国企工资低? /019

李仁君 新农村之新 /022

【学界万象】

翟 华 改行当个经济学家最容易 /028

聂辉华 谁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 /031

荆林波 杂谈京城经济学人的尴尬 /035

刘福寿 大学到底应该有多大? /039

陈 钊 复旦青年经济学者的创新之路 /044

【学问聊斋】

王则柯 “高微热”之我见 /046

汪丁丁 为经济学划界——以及由此而生的问题 /049

叶楚华 谈谈炫耀性商品的需求曲线问题

——兼评薛兆丰先生、张五常教授的需求曲线观点 /051

宋胜洲 学术的 OEM 与 ODM 模式 /058

邱 斌 如何看待经济学语言的缺失性? /063

郭梓林 人文思想与企业家的幸福 /067

【经济随笔】

朱富祥 女性适合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吗? /072

松 木 商贾之析——青边之行偶拾 /076

刘宝宏 韶山冲的“诚信饭店” /080

- 黎海仪 信息不对称和“无区别推断” /084
张恩众 城市拆迁中各方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088

【经济评论】

- 曹利群 购买产品,还是购买制度? /092
韩德强 垄断型人际关系与竞争型人际关系 /096
陈 宪 护士“缺口”的两点分析 /101
胡海鸥 “形似,而神不似”的招投标 /104

【生活中的经济学】

- 史晋川 “左脚鞋”与“右脚鞋”——完全互补性商品的故事 /108
杨在军 家族企业:家族与企业的“天作之合” /111
曹淑江 爱情、婚姻中的理性与女性的人生选择 /116
俞炜华 经济学视角下的一夫多妻制 /120

【经济学人】

- 纪 辛 中国经济学界的曾经领军人物——方显廷 /126
赖德胜 学问靠真 /132

【他山之石】

- 张晓晶 哈佛散记(三) /137
徐康宁 瑞典的森林及其他 /142
周 勤 FTA 和饮食习惯——访韩印象 /148

【经济史话】

- 李俊慧 “劣币驱逐良币”的神话——从唐肃宗的“乾元重宝”史实说起 /152
朱荫贵 老股票的故事(五):钱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背后的故事 /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30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209-04322-9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

-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第150646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6

E-mail:chazuo49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172×232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4.00元



中国经济到底翻了几番？

宋小川*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我国经济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尽管人们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论证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私下里却在议论：“100 多年了都未能翻两番，现在只剩下不到 20 年的时间还想翻两番？看来又要搞大跃进和洋冒进啦。”事实如何呢？按经济学的“70 手则”，即用 70 除以年经济增长率得出一国经济翻一番所需要的年数，如果按保守的年平均增长率 9% 算，我国经济过去 20 多年来翻了三番。中国已由 30 年前最落后的经济体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 4 大经济强国。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像脱缰了的马，越控制增长越快，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达 11.5%，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从 2002 年的 12 万亿元跃升到 20 万亿元以上，估计年底可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 3 大经济体，超越日本也只是未来几年的事情了。

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时间，国内学者的估计比较保守，认为会在 2030 年，国外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反而比较乐观，认为会在 2020 年左右。世界银行曾在本世纪初预测，2020 年中国经济会相当于美国的 140%。国内的许多媒体，特别是很多网民们不仅对国外的估计嗤之以鼻，甚至对国内学者保守的估计也持批评的态度。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中国目前的实际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你大概不把我看成精神病，也会认为我居心叵测。媒体和学界、国内和国外对中国经济总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看法上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统计方法的缺欠，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常识教育普及程度的不够，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历史上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造成经济过热导致的灾难给人们带来的谈虎色变心理。也就是说，国际上通行的一国经济总量测度方法与人们心目中的或理想的测度方法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所以，要想回答我国经济究竟翻了几番需要从 GDP 的 ABC 说起。

*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和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教授。

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用总产量、总收入和总支出三种方法测量。其中总产量方法即 GDP 方法最为流行,通常我们谈到一国经济及其增长率就是指 GDP 及其年变动百分比。GDP 即国内产品总值,按定义是指一个国家一年内其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三个要素:第一,通过计算市场价值,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测度单位,从而避免了将成千上万种不同产品的总数堆砌到一起造成的混乱;第二,通过统计最终产品和劳务,我们可以避免对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第三,GDP 只统计境内的生产活动,即我们只关心在哪生产,而不在意谁去生产,这样就避免了如何去鉴别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棘手的问题。

作为最为流行的总体经济测度指标,GDP 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GDP 忽略了非市场经济活动。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 GDP 中。第二,GDP 忽略了“地下经济”。五花八门的非法经济活动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没有计算在 GDP 中。第三,理想的 GDP 应当反映一国居民的“净经济福利”,它不仅应该统计能增进人们经济福利的“好的”产品,还应当减去降低人们经济福利的“坏的”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等。这一点全球已有共识。但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和估价大不相同,很难找到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去测量和从 GDP 中扣除。第四,GDP 忽略了闲暇,而闲暇是衡量一个社会净经济福利、社会发达和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闲暇与劳工供给的替代关系,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 统计数字会随着闲暇的增加而减少。第五,GDP 没有反映一个国家的医疗、教育福利和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平均寿命。

建国前,我国尚无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照搬了前苏联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以 GDP 为核心的一套国民经济测量体系,这套体系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 Kuznets 建立的。Kuznets 与其同事当时是用手写的资料来统计有形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如机器、厂房等长期投资,这对当时的工业社会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种计算方法对二战时期罗斯福内阁急需测度和发展美国制造坦克、军舰和飞机的能力是很方便的。机器、厂房无疑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同样,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R&D)支出也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现代经济学的投资定义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货物的生产和购买,任何一种能够在未来创造利益的行为都是



投资。很难想象 1946 年 Bugsy Siegel 在拉斯维加斯建造 Flamingo 大酒店和赌场所花费的 600 万美金是投资,而 AT&T 筹资兴建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竟不算投资,不包括在 GDP 之中。Kuznets 本人已经意识到其核算体系的局限性,不幸的是,该体系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自从以电脑和因特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和新经济出现以来,现代社会经济已日益演化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驱动力为“想法和创新”。显然,陈旧的官方数字搜集系统和测量体系只能抓住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投资,而失去了 GDP 中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分。统计学家们固然可以精确地演示建造了多少厂房这种有形资产,但却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而这些无形投资恰恰是企业在今全球经济中得以生存、具有竞争力和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格林斯潘大概是最早意识到传统的数字没有捕捉到日益崛起的知识经济的,早在 1990 年代初,他就因官方数字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新经济而烦恼和失望。1996 到 1997 年间,格林斯潘曾拒绝接受有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传统数字,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局长 Landefeld 日益感受到将反映知识经济的数字包括在官方统计中的压力。1999 年,也就是在 Kuznets 奠定了 GDP 计算的基础的 60 年后,Landefeld 和 BEA 终于决定打破常规,将企业在软件方面的支出由中间产品支出划为长期投资支出。用这种新的统计方法来重新计算 GDP,美国 1996 年的 GDP 一瞬间增加了 1150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1.5%。

这一迟到的变革无疑具有过渡性和革命性的意义。美国目前每年的软件支出为 1500 多亿美元,远远超过 1000 亿美元的电脑硬件支出。并且软件通常比硬件使用的时间长,作为长期投资支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软件是介于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的投资。说它是无形资本,是因为它是难以测量的人类知识、智力、创新和创造力的积累、发展和进步的结晶;说它是有形资本,是因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可以走进商店,用肉眼看到软件的实物形态及其五颜六色的包装,从而确认它是实际存在的。用 Landefeld 的话讲,“事先包装好了的软件是更容易‘计算’的”。耐人寻味的是,软件恰巧是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将软件划为长期投资无疑为不久的将来建立更好地反映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测量体系打开了一扇大门。

理解 GDP 的基本概念、历史演变及其局限性,特别是它对知识经济的忽略,有助于我们回答中国经济被高估还是低估这个问题。不可否认,我国 GDP 统计数字

存在着误差和重复计算,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高报经济成绩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 GDP 统计数字和预测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经济及其增长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GDP 严重低估了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13 亿人口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的价值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认为中国 GDP 被高估的人大概忘记了 GDP 的基本概念,即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劳务是以人为基数计算的,人多,对劳务的需求和劳务的供给自然多,自我服务性的活动也多。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和消费方式的不同,不同国家提供的劳务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居民的家庭经济活动提供的劳务和自我服务性活动质量高、创造的实际价值大。笔者在美国生活了 20 年,或许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东方价值观念,我的直感是中国的家庭经济活动和自我服务活动内容更丰富,质量更高,更有价值。即便按人均估算,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没有纳入 GDP 的成分也应超过美国。比如我国的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由母亲或亲属照顾的,即便是请保姆和家教也都是以付现金的方式,很少有人纳税上报 GDP。而美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把婴儿和学龄前儿童送到婴儿照顾中心和幼儿园,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昂贵的价格计入 GDP。美国家庭请一个保姆的月薪至少 1500 美金,按汇率计算,这个价钱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请一个排的保姆,而且中国保姆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要超过美国。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的退休年龄为 65 岁,并且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很多人一直工作到 70 多岁。而我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 55 岁,并且是强制的。这些退休人员退休后仍然非正式地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显然这几亿人平均每人“额外工作”10 多年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反映在官方 GDP 中。

第二,GDP 忽略了我国形形色色的非法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忽略由于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是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美国的许多州,赌博活动和以按摩为名义的嫖娼活动都属合法经营活动,并以亿万美元的价值计入 GDP,甚至以医疗为名义的毒品使用也计入 GDP。而在我国,各种各样的赌博、按摩和其他娱乐场所、吸毒和各种以逃税为目的的地下经济活动是有目共睹的。以扑克、麻将等形式的娱乐活动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些活动或者没有计入或者以很大的折扣计入 GDP。我国目前还没有销售税来反映批发商和零售商,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实际营业额。这些行业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的。为了逃税,业者们通常以各种方式巧立名



目,夸大支出,低报所得,很大程度地将合法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第三,GDP没有统计闲暇,而中国消费的闲暇总量居全球首位。第一,闲暇直接以人为计算单位,人越多,消费的闲暇越多。第二,如前所述,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所以平均每个人要比发达国家多消费10多年的闲暇。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自愿失业造成的,应当称它为非自愿闲暇。但闲暇毕竟是闲暇,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毕竟是谋生的手段,是一种负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下棋、打牌、逛公园是比艰辛的工作更好的一种选择。第三,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工作的强度和紧张程度都低于发达国家,这一点从西方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闲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看出。第四,我国闲暇的价格,即闲暇的机会成本——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对闲暇的需求量要高于发达国家。

第四,现有的GDP预测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落后但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金融业、律师业和运输业。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经济中80%的就业是由零售业、金融业和运输业提供的。而在我国,金融业刚刚步出原始状态。一个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竟然没有私人支票和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手段少得可怜,金融业提供的就业人数极其有限。我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只提供几种存款,并且这几种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很差,利息低,相互之间不能进行自由转换。这与西方国家随便走进一个银行都可以看到几十种或上百种金融产品,各种产品可以在网上自由转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我国,不仅绝大多数的市场交易活动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的,而且私人间的借贷活动相当可观,这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极不相称,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产业巨大的增长潜力。我国的律师行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创造的劳务价值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提并论。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平均每27个人就有一个律师,而我国的律师比例不到万分之一。我国流行的民间仲裁活动以调节法律纠纷也是非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有些机构收取一点费用,但与发达国家昂贵的律师费用相比,它极大地低估了GDP中的相应份额。同样,我国的人均汽车数量和飞机数量也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行业会日益显示出增长的巨大潜力。

第五,GDP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分,特别是教育投资成分。前面讨论过的GDP对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资产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投资方面的忽略在我国都存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教育投资。我国的公共教

育投资占 GDP 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私人的教育投资,实际上每个家庭在子女就学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显然每个家庭在为子女请家教、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各教育部门乱收费方面的支出,特别是许多家庭用终身积蓄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没有充分地统计在教育支出中。我国教育领域的地下经济,特别是家庭内部提供的教育服务远远超过其他产业,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如果把私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换算成税收,然后用做政府的教育支出,我国的教育投资,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也不会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很少有家庭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终身积蓄用做子女教育,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女到 18 岁后就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的教育费用主要靠打工、贷款、奖学金和从军等各种方式解决。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居民会像中国人这样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美国的文化褒奖酷(cool)而蔑视(nerd)理工,因而中学生的数理基础普遍很弱,大学生中特别是研究生中读理工专业的越来越少。比尔·盖茨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本身”。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的政客,尤其是国会议员大多为律师出身,而中国的领导人更多为学理工出身。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教育乃科学技术之母。在目前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决定赢家,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压倒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私人教育投资的迅猛增长,扎实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必定会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六,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当前全球竞争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外包和外购。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仅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且日益增加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信息产业、软件工程、金融保险业和制药业也以外包和外购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当前激烈的全球价格竞争中,谁肯花 10 万多美元在美国雇佣电脑程序师而不在中国或印度花低于其五分之一的工资雇人去做同样的工作呢?这种全球化和外包外购浪潮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美国《商业周刊》2004 年 12 月 6 日的专题报告《中国价格》,详细地描述了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与美国企业展开的激烈的价格战。该文把“中国价格”称为美国企业界最可怕的词,并用美军攻打伊拉克第一波冲击时使用的代号来形容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和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威慑力量。



当然,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特别是医疗、福利待遇和社会安全保险,我国的GDP要打很大的折扣,但这些折扣要远远低于低估的成分,这大概是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官方统计数字持乐观的态度。然而,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搜集系统毕竟历史短,透明度不够,与国际通用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为了保持统计资料的历史可比性,资料搜集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应当是一个渐进和稳定的过渡。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诸方面的原因,这些忽略和低估对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的实际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率,特别是增长潜力要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的GDP向上作了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提高劳务,特别是电脑、因特网服务等知识经济成分占GDP的比重。经过修订后的中国经济1993~2004年的增长率接近10%。由于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较大,这一修订使全球的GDP自1992年以来几乎每年上调了0.1个百分点。这一修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

每逢讲到这些,总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GDP统计方法的这些问题,不光中国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有啊?千真万确!与其把这一质疑看做对中国GDP统计方法的辩护,倒不如把它当做对GDP低估了中国经济这一事实的确认。正是因为GDP统计方法局限性的普遍存在,我们才不能用“双重标准”来低估中国经济。不仅如此,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低估要远远超过美国。以地下经济为例,美国地下经济创造的价值每年估计有15000多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美国政府为此每年损失的税收收入为3100多亿美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不健全的国家,这种地下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曾发表过若干国家地下经济的相对规模。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规模是最小的,其次是日本和德国。地下经济超过和接近GDP60%的国家有玻利维亚、阿塞拜疆和津巴布韦。令人瞩目的是亚洲的泰国位于第四,其地下经济超过GDP的一半,这大概与泰国经济中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有关。中国的地下经济规模我们无法搞到具体的数字,但你我他都心知肚明。

做个极端的演绎。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报告,发达国家GDP中的劳务部分占三分之二,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虽然近年来有大幅度的增加,但仍低于40%。在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中国GDP的修正中,劳务的份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修订后的劳务比重仍为41%。假定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和自我服务性活动,即

还没有纳入 GDP 的劳务部分与人口呈正比,中国的人口超过美国 4 倍,那么这部分未计算的 GDP 就应至少相当于美国的 4 倍。然后再按发达国家 GDP 中的劳务部分占三分之二换算,仅这一部分调整,就足以使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美国,你就不会再认为我居心叵测,大概会认为我强词夺理了吧。那就强词夺理到底吧。在美国我为 10 岁的小女儿做家教,机会成本是每小时 100 多美元,而在中国对她进行家教,流行的价格为每小时 20 元人民币。难道同样的服务和服务对象到了大洋彼岸,顷刻间价值就贬低了这么多?即便已纳入 GDP 的部分,我国服务业创造的价值按国际通行的标准也被大打折扣。在美国,25 分钟的理发加小费需 25 美元,而在中国同样质量的服务只需要 1 美元,仅此一项中国 GDP 中的相应份额就低估了 25 倍。并且中国每年的理发人数超过美国 4 倍。由于便宜,中国人平均理发的频率也远超过美国人,许多人是为了去享受洗发和按摩服务,这方面的 GDP 低估了多少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小学算术问题。

说到这里,或许你已对本文的题目失去了兴趣,GDP 到底翻了几番,还能翻几番,似乎不太重要啦。“管它翻几番,要紧的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说得好,由于 GDP 中劳务部分比重的日益增加,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GDP 就越大,因此,关键是人均 GDP。2005 年美国的人均实际 GDP 相当于中国的 34 倍,即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也相当于中国的 8 倍,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包括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改善教育条件,减少环境污染,以提高普通劳苦大众的快乐和幸福水平为重心,这才是人间正道。了解了 GDP 的 ABC,我们就不再会为各种各样的 GDP 数字所困惑,不再为“越估越高”的 GDP 增长率而情绪化。因为官方公布的 GDP 数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反映实际 GDP 的增加,而是由过去的非市场经济活动转化为市场经济活动所致。比如,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并没有统计一日三餐创造的劳务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深化,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庭,享受餐厅的服务,应将这一部分劳务创造的价值添加到官方 GDP 当中。认识到了这些,以后再有人跟你讲中国经济哪一年会超过美国时,你就会见怪不怪啦。



领导干部要重视“案例工作法”

李海舰*

案例是对一些领先企业、行业和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典型做法及其经验教训的高度理论总结,其他企业、行业和区域通过学习,一则可以引以为鉴,少走弯路,又快又好地发展自己;二则沿着这一创新思路,结合本地实践,开展新的创造性的工作。案例是被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成功做法,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强大引导功能,它给人以智慧和启迪,赋予领导者解决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同时,案例提供间接管理经验,可为他人实务操作提供指导。当然,案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其对实际工作的借鉴意义是同理的。

运用案例指导企业、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工作方式。据统计,在哈佛商学院的 MBA 教育中,案例教学的比重占到了 85%,其学员在两年里要分析、研修 600~800 个案例。以后回到公司中去,他们所采取的具体处置方案,基本就是这 600~800 个案例方案的不同组合而已。国内领导干部到发达地区考察学习、交叉任职,实际上也是运用案例指导本地实际工作的一种具体方式。

近些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内一些地区创造出了不少成功案例,对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参考价值极大。

(1)烟台南山。过去,南山荒芜一片,看护成本很高,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一大“包袱”。后来,“包袱”成为“财富”。一是山顶修建大佛,山上布满中华五千年的历代景观;二是山间修筑“长城”,既是人文景观,又是防火隔离带;三是山下建有宾馆、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等。这样,整座南山集旅游、观光、娱乐、休闲、度假、购物、会议、参观、文化、教育于一体,不想赚钱都难。

(2)北京顺义。顺义几届最高领导发展经济的思路可概括为“苹果树理论”。这里,“苹果”是指税收,“苹果树”则指企业。到目前为止,顺义最高领导已换过多届,但每届最高领导所形成的发展思路和做法都比上一届成本低、效益高。第一届领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导“种苹果树”，即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但是，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从创建到形成规模、产出效益乃至上缴税收，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第二届领导改为“移苹果树”，即大力发展中外合资企业。即把在国外发展成熟的大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方式落户顺义，这样3到6个月即可产生经济效益，半年之内就可上缴税收。第三届领导则“从移‘躯体型’苹果树转向移‘脑袋型’苹果树”。“躯体型苹果树”，指生产制造企业，它不仅大量消耗顺义的淡水资源、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而且还会产生环境污染；而“脑袋型苹果树”，则指公司总部，其好处是：在外地生产，在本地缴税。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中心区，正在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和环境优势，吸引公司总部前来“居住”，以此打造“总部经济”。

(3)浙江温州。温州经济发展可从多个层面进行理论概括，例如“小狗经济”、“地瓜经济”、“零度经济”，等等。讲讲“零度经济”。一是零资源。温州的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猪养得不多，牛养得很少，却成了全国最大的猪皮革、牛皮革生产基地。二是零技术。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过去也没有摩托车生产企业，而温州的塘下镇却有数以千计的汽摩配件生产企业，成为全国四大汽摩配件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三是零生产。温州的美特斯邦威公司，没有自己的生产厂房，但一年可以销售10多亿元，它专门负责产品研发和品牌经营，把生产环节交给了外地企业。“零度经济”，通俗地讲就是“无中生有”现象。

一般而言，典型案例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产物。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即通过“个案”找出事物背后规律性的东西。俗话讲：“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通过典型案例悟出“道理”（规律），用“道理”（规律）来指导实际工作。因此，案例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但是其背后的“道理”可谓“大道相通”。

在运用案例指导实际工作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注重案例整理工作。可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对国内外领先企业、行业和地区在解决热点、难点、疑点和重点问题上的前沿案例加以搜集、整理，有针对性地建立一批“案例库”。二是加大案例研究力度。任何案例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约束条件，即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这里，必须弄清案例成功的关键环节，再结合时下因素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从中得出多种指导实际工作的可行性方案，然后召集专家进行充分论证，最后拍板夺定。三是加强干部队伍案例教育培训工作。一个地方政府，其最高领导者的职能之一就是经常性地给基层领导“上课”，即建立“学习型政府”。通过有针对性的案例教育，启发基层领导拿出适合自身情况的具体方案，最高领导则是拍板、检查，改变以往总由最高领导出具具体方案，基层领导只是执行而已的局面。



国有企业是做什么的

高明华*

国有企业是做什么的？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也毋庸置疑的问题。然而，中国国有企业改了20多年，却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人搞不懂。因此，这个问题还是有说一说的必要。

一、国有企业是为满足公共利益而产生的

国有企业是做什么的，这要从国有企业的产生谈起。国有企业因何而产生，这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的本性问题。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即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全民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这与股东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没有什么区别；二是公共性，既然国有企业是全民的，那么它的收益就要回归全民，或者说要回报全民，这与股东从其所持股的股份公司中领取股息红利没有任何区别。不过，二者还是有一点区别：股东收取股息红利是个人行为，而全民收取股息红利则是政府代为，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受益就只能体现为政府的公共投资上，即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公共性上。

“全民”这个概念是很抽象的，很难想象全民能够直接从国有企业领取股息红利，所以，公共性便成为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换言之，国有企业存在的原因就是公共性，甚至可以说，公共性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唯一原因。如果企业要盈利，私有企业足矣，依法纳税便是了。国有企业要盈利，但不必然要盈利，盈利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盈利服务于全民，即提供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保健、扶贫（像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城市公共交通、国防等。也可以不盈利，而是直接服务于公民，如向公民提供低价优质产品（像居民用电、天然气）、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国有企业就是因公共性而产生的。原因很简单，公共领域难以克服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所以私有企业不愿意进入，进来以后赚不了钱。但是，公共品对于公众又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决定了只能由国有企业来生产这些公共品。相反，私人品只有私有企业生产才最有效率，而国有企业由于没有唯一的所有者，产权不甚明晰，从而注定其效率达不到最

*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